

1920年代後期的蘇蒙關係

——以「雷斯庫洛夫事件」為中心

● 谷繼坤

摘要：本文依據俄國解密檔案，通過考辨「雷斯庫洛夫事件」的由來與真相，闡明1920年代後期共產國際對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策略及其影響，指出蒙古人民革命黨早期領導人強烈的本土自主性意識是事件發生的根本驅動力量。以1925年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決定驅離共產國際駐蒙古全權代表雷斯庫洛夫(Тураp P. Рыскулов)為契機，蘇聯對外蒙古進行了深度政治干預，通過中斷聯繫、扶持黨內反對派等手段，實現了對蒙黨中央的改組。共產國際藉此在蒙黨中央確立了佔優勢地位的政治影響力，蒙古人民革命黨則成為了貫徹蘇聯對外蒙古既定政策方針的忠實執行者。

關鍵詞：共產國際 「雷斯庫洛夫事件」 蒙古人民革命黨 「農村派」 蘇蒙關係

長期以來，學術界關於外蒙古^①問題的研究集中於1911、1921、1945年外蒙古自中國分離的三次「獨立」過程，而忽視了蘇聯對外蒙古的內部改造問題。蘇聯時期的學者多從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認為蘇聯對外蒙古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給予了極大支持^②。二十世紀50至80年代的外蒙古學術研究，整體處在蘇聯史學學說的影響之下，帶有嚴格的意識形態色彩，積極宣導蘇蒙友誼，而對蘇蒙關係的消極方面和共產國際在外蒙古活動的負面作用隻字不提^③。中國學界的關注點多集中於外蒙古獨立問題，材料上多使用民國時期外交檔案資料^④，觀點上多從蘇聯推動世界革命、以國家利益為上等方面立論^⑤。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係檔案收集及歷史研究」(15@ZH009)第三期子課題「蘇聯對外蒙古內部改造研究(1921-1949)」的階段性成果。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修改意見，筆者自負文責。

本文即以近年來筆者收集的俄國檔案為核心，討論共產國際和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前稱蒙古人民黨）圍繞「雷斯庫洛夫事件」的鬥爭博弈問題。本研究可以為更深刻地理解外蒙古何以在1921年之後同中國漸行漸遠並最終在1945年獨立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即蘇聯對外蒙古內部改造的視角——正是得益於1920年代對外蒙古的政治改造，蘇聯才能夠將自身的諸如「集體化」等發展模式套用於外蒙古，並最終將外蒙古改造成為其「衛星國」。從此角度看，1945年外蒙古的徹底獨立只不過是蘇聯長期以來對外蒙古政策的應有之義。

一 緣起：「雷斯庫洛夫事件」

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俄將外蒙古視為打破自身孤立地位、捍衛遠東安全，以及在東方國家推動世界革命的關鍵一環。為此，1918至1921年間，蘇俄將其擴張性的意識形態目標和尋求國家利益的主張結合在一起，成功實施了對外蒙古的「三位一體」戰略：1921年2月俄國內戰期間，恩琴（Роман Ф.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率領白衛軍進入外蒙古，抵消了中國在外蒙古的軍事實力，蘇俄紅軍進而以消滅恩琴白衛軍為契機入蒙；在扶持蒙古人民黨掌握政權的同時將自身影響力滲入外蒙古；通過保持在外蒙古的軍事存在促使中國方面與其談判，進而打開同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局面^⑥。在此過程中，共產國際扮演了重要角色。

1920年初，共產國際在伊爾庫茨克成立了蒙古西藏處，專門應對外蒙古事務。隨着北洋軍閥徐樹錚強力撤銷外蒙古自治，共產國際即以蒙古西藏處為依託，加緊了對外蒙古地區的地下革命鼓動和暗中支援工作。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當時在外蒙古進行革命活動的喬巴山（Хорлогийн Чойбалсан）和蘇赫巴托（Дамдин Сухэ-Батор）各自領導的革命小組合併成立了統一的革命組織——蒙古人民黨，並在1920年8月派遣「七人代表團」訪蘇求援，獲共產國際接待。最終，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援助下，蒙古人民黨在買賣城西部組建了游擊隊，並在1921年3月中旬改編成蒙古人民軍。6月16日，蘇俄紅軍出兵外蒙古，在外蒙古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有力抵抗。7月6日，蘇俄紅軍和蒙古人民軍的先頭部隊進入庫倫，蒙古人民黨奪取了外蒙古政權^⑦。

共產國際在幫助蒙古人民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事實上確立了同蒙古人民黨之間「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但雙方關係並非親密無間，而是一開始即存在分歧和矛盾。1921年3月18日，蒙古人民軍在蘇俄支援下攻佔了中國軍隊在外蒙古最後的軍事據點——買賣城，不料城內突然發生大火，於是蒙古人民黨決定將買賣城內的大量商品運往遠東共和國（蘇俄在遠東地區建立的緩衝國）境內的特羅伊茨科薩夫斯克出售，以換取必要的物資。在商品運出買賣城時，蘇俄對外貿易部門派駐的代表已經收取了關稅，然而當這些商品運至特羅伊茨科薩夫斯克時，遠東共和國海關機構再次要求支付關稅。這引起了蒙古人民黨人的極大不滿。遠東共和國不僅對他們的不滿不予回應，反而將商品倉庫查封並且派遣軍事人員看管倉庫^⑧。

5月8日，怒不可遏的蒙古人民黨人將此事告知時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共產國際駐遠東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Борис З. Шумяцкий)，並請求蘇俄方面「採取嚴格的措施來制止這種可惡的行為」。舒米亞茨基獲悉事件後，在給時任西伯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斯米爾諾夫(Иван Н. Смирнов)的報告中指出，「遠東共和國無論如何都不應當收取關稅，我們對外貿易部在買賣城的工作人員已經收取了那些由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支配商品的關稅，緩衝政府所做的這種行為是絕對不允許的，是愚蠢和不知分寸的」^⑨。12日，斯米爾諾夫致電遠東共和國政府，要求其停止針對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商品的「非法行動」，因為「這些行為是絕對不允許的，並且將會引起蒙古方面嚴重的不滿」^⑩。諸如此類爭執，在共產國際和蒙古人民黨早期關係中屢見不鮮^⑪。

此外，蒙古人民黨建政之初便發生了激烈的黨內鬥爭，共產國際也參與其中：1922年8月，時任蒙古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鮑道(Догсомын Бодоо)等人被逮捕槍斃；1924年8月，時任蒙古人民黨中央主席、政府副總理和蒙古人民軍總司令丹增(Солийн Данзан)被逮捕槍斃^⑫。

概言之，上述蒙古人民黨早期領導人自清末即投身於外蒙古的獨立運動，有着強烈的本土自主性意識，很大程度上只是將蘇俄視為外援而不希望莫斯科對其過多干預，因為這些早期領導人很多同封建主和喇嘛階層有着密切關係，甚至本身即是封建主和喇嘛出身，故而共產國際對這些領導人也多持不完全信任的態度。這是共產國際同蒙古人民黨早期分歧矛盾以及黨內鬥爭的重要原因，也是「雷斯庫洛夫事件」發生的根源所在。

蒙古人民黨奪取政權之後，共產國際也很快派全權代表進駐蒙古人民黨中央全面參與蒙古的黨政建設。除卻激烈的黨內鬥爭之外，1924年外蒙古政局也發生了劇烈變動。5月20日蒙古活佛博克多格根(Богдо-гэгэн VIII)去世，6月蒙古人民黨中央決定「建立不設總統的共和國制度」^⑬。在此背景下，10月初，共產國際首任全權代表雷斯庫洛夫(Тураp P. Рыскулов)抵達庫倫，常駐蒙古人民黨中央指導工作。

雷斯庫洛夫抵達庫倫後的第二天即參加了蒙古人民黨中央主席團會議，並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1924年8月11日〈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決議〉，主要內容包括：蒙古人民黨在領導外蒙古革命過程中，由於面臨中國武裝入侵的危險，不得不在對內政策上讓步(例如同封建神權集團合作)。因此，蒙古黨和政府必須徹底實施將民眾從封建神權的剝削中解放的政策，並且廣泛吸納基層人員進入中央工作，等等^⑭。蒙古人民黨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紀律並執行其指示。雷斯庫洛夫指出蒙古人民黨面臨的首要任務，即召開大呼拉爾會議，修改憲法以確保民眾能夠參加國家建設；修改黨綱和黨章，組織動員農村中貧困的阿拉特(Арат，外蒙古農牧民的統稱)和城市手工業者積極參與國民經濟建設；進行「清黨」運動，純潔黨的隊伍，加強黨的紀律，大量吸收貧苦出身的人入黨；建立黨校，從中央派遣工作人員前往地方進行指導工作，從民眾中挑選工作人員開展各項運動；着手處理喇嘛問題，等等。對於開展上述工作的目的，雷斯庫洛夫在致莫斯科的報告中直言是為了「最快速地鞏固並且增強我們在蒙古的地位」^⑮。雷斯庫洛夫同時也向蒙古人民黨人明確表示：「共產國際派我到蒙古來，希望在這裏切實建立一個強大並且在意識形態

上親近於我們的黨，共產國際想看到蒙古實施國家民主化，蒙古人民可以真正地管理自己的命運。」^⑩

需要指出的是，除卻積極參與蒙古人民黨的黨政建設工作，雷斯庫洛夫還負有一項重要使命——削弱蒙古軍事委員會主席、蒙古人民黨中央主席團成員仁欽諾（Элбек-Доржи Ринчино）在蒙古人中的影響力。10月19日，共產國際電示雷斯庫洛夫：「在完成預定的任務過程中，應當逐步削弱仁欽諾等某些民族主義者的影響力。」^⑪同一時期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的一份檔案中也明確提到，「我們派遣雷斯庫洛夫前往蒙古的目標是進一步加強蒙古黨的建設工作，推動蒙古國家建設的民主化以及逐漸把蒙古人從仁欽諾的影響中解放出來」^⑫。也就是說，削弱仁欽諾的影響力是共產國際對外蒙古既定政策目標之一，也是雷斯庫洛夫在外蒙古的工作任務之一。

共產國際之所以要削弱仁欽諾的影響力，原因有三方面：第一，莫斯科起初就對仁欽諾不完全信任。早在1919年春天，仁欽諾就參加了由白衛軍中將謝苗諾夫（Григорий М. Семенов）主持召開的旨在建立「大蒙古國」的赤塔會議。因為仁欽諾是布里亞特蒙古人，受過高等教育，懂俄語和蒙古語，共產國際便吸收他參加對外蒙古的工作，但正如俄共（布）伊爾庫茨克組織局對他的政治鑒定所言，「仁欽諾熟悉東方民族特別是蒙古的革命工作，其對於東方的革命工作是有益的，但其在外貝加爾地區依附謝苗諾夫的活動尚無法弄清」^⑬，因而他未能獲得莫斯科的完全信任。

第二，仁欽諾深度參與了外蒙古早期的革命活動，並已經在蒙古人民黨內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前述「七人代表團」秘密訪問蘇俄尋求援助時，仁欽諾即是接應者和翻譯。隨着外蒙古局勢的發展，仁欽諾被蒙古人民黨任命為該黨駐伊爾庫茨克的全權代表，到1924年更進入了外蒙古的最高領導層^⑭。

第三，仁欽諾除了有強調外蒙古要保持獨立的「民族主義」情緒外，還有着將包括外蒙古、內蒙古、布里亞特蒙古、卡爾梅克、圖瓦等同一族源的所有蒙古部落聯合在一起，組成所謂「大蒙古國」的「泛蒙古主義思想」。對於蘇聯意圖在外蒙古施加的影響力，仁欽諾也持非常鮮明的態度，他曾強調：「不能認為蒙古人是孩童，不能用蘇聯人把蒙古人從重要崗位上都頂換下來……」^⑮

基於上述原因，莫斯科開始考慮削弱以至清除仁欽諾的影響力。雷斯庫洛夫到任後不久即同仁欽諾發生了激烈爭吵，兩人關係一度十分緊張，雙方的分歧主要集中於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問題。仁欽諾認為憲法草案中關於建立阿拉特聯盟的提法不合時宜，但雷斯庫洛夫認為若不如此，會使蒙古人民黨與阿拉特疏遠。

第二，在討論蒙古人民黨新的黨綱和黨章時，仁欽諾主張暫緩修訂黨綱和黨章，但在雷斯庫洛夫的堅持下，蒙古人民黨於1925年3月中央全會上通過了新的黨綱和黨章草案。與此同時，在雷斯庫洛夫的建議下，蒙古的首都名稱由庫倫改為烏蘭巴托。

第三，仁欽諾認為雷斯庫洛夫簡單地將蘇聯的工作方法移植到外蒙古工作當中去，而沒有考慮到外蒙古本身的實際情況，實際上是反對雷斯庫洛夫

照搬蘇聯的工作經驗；對於雷斯庫洛夫所主張的關於調整蒙古對外和對內貿易的決定，仁欽諾也認為有失妥當^②。

第四，圍繞泛蒙古主義問題和中國內蒙古地區的革命問題，雷斯庫洛夫與仁欽諾等外蒙古領導人同樣存在分歧。如上所述，對於外蒙古的大部分領導人來說，建立「大蒙古國」的「泛蒙古主義思想」向來存在着吸引力，而仁欽諾一直都是這種思想的倡議者和支持者。1925年5月26日，仁欽諾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以下簡稱「蒙黨中央」）會議上作了〈泛蒙古主義和我們的國外工作〉報告，指出「沒必要否定我們是泛蒙主義者……這〔泛蒙古主義思想〕是我們手中重要的民族思想武器」，他直言，蒙古人應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③。仁欽諾和雷斯庫洛夫並就內蒙古地區革命問題進行了激烈的政治辯論。雷斯庫諾夫表示，在內蒙古開展革命的問題應由莫斯科解決，因為蒙古人民革命黨沒力量去解決這個問題，「共產國際現在所能允許的——雷斯庫洛夫說——就是同意在內蒙古進行秘密地下工作……蘇聯不能為了外蒙古而公開向北京聲明，將內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④。可以看出，仁欽諾致力於為聯合所有的蒙古部落而鬥爭，而莫斯科則對泛蒙古主義運動持審慎態度。

從1925年1月開始，雷斯庫洛夫與仁欽諾在各自給莫斯科的報告中均互相指責對方。雷斯庫洛夫在給共產國際的總結報告指出，其本人遭到了仁欽諾的公開敵視，且兩人之間的矛盾正不斷加深，為此建議將仁欽諾調離外蒙古^⑤。仁欽諾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也對雷斯庫洛夫提出了控告，指責他在外蒙古實行獨裁政策，不了解當地實際情況，並且陰謀反對其本人，請求莫斯科對兩人的關係進行「有效的干預」^⑥。在這樣的背景下，外蒙古領導層對雷斯庫洛夫的不滿日益集聚，最終演變成「雷斯庫洛夫事件」。

參與策劃「雷斯庫洛夫事件」的外蒙古領導層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蒙古人民革命黨主席丹巴道爾吉（Цеден Дамба-Доржи）與副主席扎丹巴（Навандоржийн Жадамба），他們是蒙古人民黨的早期黨員，長期從事黨務工作，並擔任領導職務；另一部分是蒙古政府總理策倫道爾吉（Церен-Дорджи）與外交部長阿莫爾（Анандын Амар，後來出任蒙古政府總理），他們都是出身於舊體制的老幹部，從外蒙古自治政府時期就擔任公職且擁有豐富的政務經驗。

6月15日，由上述領導人組成的蒙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在沒有事先通報共產國際和通知雷斯庫洛夫本人的情況下，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了仁欽諾與雷斯庫洛夫之間的矛盾。會議認為，他們在涉及蒙古人民革命黨工作的諸多問題上存在着嚴重分歧，而且兩人的關係朝不斷惡化的趨勢發展，如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將會對蒙黨中央和黨的整體工作造成損害。會議指出，雷斯庫洛夫作為共產國際的全權代表，從抵達外蒙古之日起領導了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工作，雖未違反共產國際的主要原則，但他對仁欽諾採取了敵視態度，並且努力吸引其他黨員同志站到自己一方，因此，在某些黨員之間出現相互爭吵的情況。雷斯庫洛夫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所有問題上表現出大權獨攬的傾向，在沒有向其他中央委員打招呼的情況下，經常做出一些「沒有分寸的行為」，比如曾經表示：「如果我不在了，而仁欽諾還留在你們的軍事委員會裏，那麼

蘇聯政府將不會再給你們提供武器。」雷斯庫洛夫脾氣暴躁，且致力於營造其本人是外蒙古最高領導人的氛圍；在落實共產國際1924年8月的決議時，需要充分了解外蒙古當地的情況，但雷斯庫洛夫並未做到這點。鑒於此，會議決定擁護共產國際的政策，但「將上述情況通報給共產國際並請求共產國際召回雷斯庫洛夫，同時派遣新的全權代表前來」^②。此即「雷斯庫洛夫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此時雷斯庫洛夫作為共產國際駐外蒙古的首位全權代表只工作了九個月。圍繞「雷斯庫洛夫事件」的後續解決，共產國際與蒙古人民革命黨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博弈。

二 博弈：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堅持」與共產國際中斷聯繫

「雷斯庫洛夫事件」發生後，共產國際開始將上述外蒙古領導人視為「右傾派別」^③。因此，共產國際着手培植作為反對派的「農村派」，即新的「左派」集團來實現對蒙黨中央的改組。「農村派」源於俄國檔案中的“Худон”一詞，本意是從外蒙古阿拉特和農村黨組織中提拔進入蒙黨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的總稱。外蒙古以遊牧業為主，在當時的共產國際文件中，外蒙古農村是相對於烏蘭巴托城市而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蘇聯對外蒙古的發展設想一直沒能有效貫徹施行，出現了類似於「蘇聯的命令不出烏蘭巴托」的情況，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外蒙古上層領導精英自清末即投身於獨立運動，甚至很多出身於喇嘛或封建主，他們對於蘇聯的指示並未言聽計從。蘇聯對此採取的主要措施是：從外蒙古農村提拔基層工作人員組成所謂「農村派」，作為蒙古人民革命黨黨內的反對派，逐步取代外蒙古現有領導層。相較而言，「農村派」對於蘇聯的指示更加服從。雖然共產國際一直推動蒙古人民革命黨從農村中吸納人員參與外蒙古黨和國家建設，但真正被提拔進入蒙黨中央的「農村派」幹部並不多，且一直處於少數，因此長期以來不能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這一時期「農村派」在蒙黨中央的代表人物是擔任小呼拉爾主席團主席的根敦（Пэлжидийн Гэндэн）。

1925年7月2日，蒙黨中央通過蒙古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全權代表處將關於「雷斯庫洛夫問題」的會議情況及決定，以信件的形式轉交共產國際執委會，正式要求共產國際召回雷斯庫洛夫^④。為此，共產國際決定派遣遠東書記處副主任沃伊京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 Войтинский）為首的代表團前往烏蘭巴托進行調查。6日，代表團抵達烏蘭巴托。沃伊京斯基經過調查，認為仁欽諾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而且將自身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泛蒙古主義思想」用革命話語進行「包裝」，可以說「仁欽諾待在外蒙古的每一天都對雷斯庫洛夫的工作造成了損害」。此外，雷斯庫洛夫的工作方法被認為不夠靈活，如使用共產國際的權威壓制某些蒙黨中央委員等，而這些錯誤在很大程度上為仁欽諾所利用^⑤。

7月8日，蒙黨中央因應共產國際的調查結果，通過了〈關於請求共產國際派遣新代表前來的決議〉。決議指出，蒙黨中央充分肯定雷斯庫洛夫對外蒙

古的國家建設提供了很大幫助。儘管雷斯庫洛夫個人存在諸多缺點，蒙黨中央過去和現在都認為他的政治路線對於外蒙古人民來說是正確的和有益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雷斯庫洛夫的工作方法同外蒙古的實際情況很難相適應，他與仁欽諾在外蒙古黨和國家建設的一系列問題上存在原則性分歧，此種情況持續下去會對蒙古人民革命黨本身的工作產生危害。蒙黨中央認為，如果兩人之間的鬥爭持續，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蒙黨中央的解體，為此「我們決定請求共產國際召回雷斯庫洛夫，並且派遣其他的工作人員來替代，同時派遣仁欽諾前往莫斯科」。蒙黨中央聲明，雖然他們做出了這個決議，但這並不意味着未來的工作不需要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經由雷斯庫洛夫所實施的路線仍然是蒙黨中央未來工作的基礎^⑩。可以說，沃伊京斯基代表團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使蒙黨中央緩和了之前的說辭，但並未改變他們的決定——譴責雷斯庫洛夫的工作方法，且堅持要求共產國際召回雷斯庫洛夫並派遣新的代表。

7月10日，沃伊京斯基向蒙黨中央宣布了代表團的決定：同意蒙黨中央的決議，免除仁欽諾擔任的所有職務並派遣其前往莫斯科，雷斯庫洛夫在將事務移交給代表團任命的共產國際駐蒙黨中央臨時代表阿馬加耶夫(Матвей И. Амагаев)之後，也將離開外蒙古返回莫斯科。雷斯庫洛夫返回莫斯科後，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了總結報告。8月1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審議了他的報告，認為其工作路線整體正確，共產國際代表常駐蒙黨中央是必要的，決定正式任命阿馬加耶夫為共產國際駐蒙黨中央新任全權代表。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了給蒙黨中央的指示信，對「雷斯庫洛夫事件」做出了正式結論。信中提到，共產國際認為蒙黨中央完全接受了共產國際1924年8月的決議；可以肯定，蒙黨中央在近期的政策路線是正確的。同時，共產國際提請蒙黨中央注意，「沒有事先同共產國際商談，蒙黨中央不能提出召回共產國際的代表，尤其是像雷斯庫洛夫同志這種情況。否則，共產國際將不會向蒙古人民革命黨提供必要的援助。雷斯庫洛夫同志作為共產國際駐蒙古人民革命黨全權代表期間所提出的路線方針，蒙古人民革命黨今後應當堅決執行」^⑪。

顯然，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堅持下，共產國際接受了「既成事實」——對於蒙黨中央要求召回雷斯庫洛夫的決定予以承認，以妥協的方法解決了「雷斯庫洛夫事件」所帶來的衝突。這是蒙黨中央尋求獨立自主嘗試的一次勝利，也是外蒙古領導人對共產國際和蘇聯不滿情緒的一次集中爆發。對於共產國際來說，該事件無疑證明蘇聯在外蒙古的政治影響力並非絕對穩固，外蒙古領導人竟然在事先未請示通報的情況下擅自決定停止共產國際代表的職權。因此，共產國際也開始重新審視並改變對外蒙古的政治策略，着手培植「農村派」以實現對蒙黨中央的改組。

1927年1月17日，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做出了〈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蒙黨中央面臨的最重要任務是「激起並增強阿拉特的政治積極性，吸收阿拉特中的積極份子進入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並提醒他們關注喇嘛問題，認為喇嘛份子仍然致力於「重建以活佛為首的封建神權體制並恢復過去佛教強大的政治經濟勢力」。為此，共產國際要求蒙古人民革命黨明白「反動喇嘛還沒有被最終摧毀，只是暫時退卻」^⑫。共產國際的新決議實際意味着否決了前述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6月和7月的決議。

令共產國際意想不到的，蒙黨中央對共產國際這項決議進行了激烈批評。丹巴道爾吉在沒有與阿馬加耶夫商議的情況下召開會議，向蒙黨中央提出共產國際的決議「整體上是不正確的」，認為決議歪曲了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政策，並表示如果蒙黨中央通過這項決議，他本人「將被迫離開工作」，即以辭職來作出抗議。丹巴道爾吉並向蒙黨中央遞交了一封致共產國際的信，在信中對共產國際的決議幾乎進行了逐條批駁，認為是「共產國際對蒙古人民革命黨內部事務的干預」。顯然，共產國際低估了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人尋求獨立自主發展的決心。阿馬加耶夫對丹巴道爾吉進行了駁斥，直言蒙古人民革命黨有脫離共產國際領導的危險傾向，而蒙古人民革命黨脫離共產國際領導的那一天，就意味着該黨不再是保衛外蒙古革命和阿拉特利益的黨。與此同時，「農村派」領袖根敦也和丹巴道爾吉針鋒相對，發言表示共產國際的決議「在整體上是正確的」。雖然如此，蒙黨中央依然決定派遣專人向共產國際寄送特別信件，闡述反對共產國際上述決議的意見和理由^⑤。

5月24日，蒙黨中央派遣專人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遞交了針對上述決議的覆信，要求共產國際對決議中的「某些條款進行進一步的解釋」。覆信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外蒙古多年以來深受內外壓迫，相較於其他國家十分落後，而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也只有七年時間，因此「在解決蒙古國內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時要謹慎，要考慮外蒙古當地的自身條件」。第二，對於喇嘛問題，當前的政策並未使外蒙古的民族革命運動受到損害，因此「沒有理由和根據來改變當前對喇嘛的政策」。第三，外蒙古人民長期以來受到壓迫剝削，對於國家事務「至今仍愚昧無知或一竅不通」，蒙黨中央雖然致力於提拔有能力的阿拉特替換黨和國家中不合格的工作人員，但是對此「沒有過高估計」，因為阿拉特當中很少有人符合條件。第四，蘇聯向外蒙古派駐指導員的制度在蒙古人民黨成立開始已長期存在，不可否認，沒有蘇聯指導員的幫助，「我們的工作是無法完成的」，但是部分蘇聯指導員「表現得漫不經心，不積極或是彼此建立小的集團，耍陰謀詭計，通過誣衊誹謗且經常無緣無故地擅自逮捕沒有罪責的外蒙古工作人員」^⑥。

可以看出，此時共產國際同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關係十分緊張。一方面，蒙古人民革命黨派遣專人攜帶信件前往莫斯科，要求共產國際就決議做出進一步解釋，可以說是以此向共產國際表達了抗議。另一方面，從覆信內容來看，蒙黨中央幾乎逐條批駁了共產國際的決議，凡此種種，無疑表明外蒙古領導層致力於保持自身的獨立自主性。

蒙古人民革命黨對共產國際的不滿，即前述共產國際所認為的「右傾」表現，也可以從阿馬加耶夫的報告中看出。8月31日，阿馬加耶夫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寄送了政治報告，主題為〈蒙古人民革命黨農村派集團同右派的鬥爭以及我們的任務〉。報告列舉了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多種「右傾」表現：第一，公開反對共產國際，批評共產國際1月17日的決議，致力於削弱共產國際對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政治影響力。第二，欺騙共產國際，認為這些「右派集團」以漂亮的語言為掩護，如「蒙古人民革命黨日夜考慮用阿拉特來替代黨和國家工作中不合適的人員」，而其真實目的在於希望共產國際批准蒙黨中央的工作報告，但共產國際1924年8月的決議實際上沒有得到落實。第三，利用蘇聯（部分工作

人員)的錯誤來放大蘇聯在外蒙古路線政策的失誤，敵視並反對蘇聯，視蘇聯對外蒙古的政策為擴張政策。第四，採取清除蘇聯在外蒙古財政部的指導員等措施，致力於削弱蘇聯在外蒙古的經濟影響力。第五，不經蘇聯同意而確定新的對外政策，同時散播迷戀德國的社會風氣。第六，通過向「農村派」領導人施壓來增強自身在外蒙古領導機構中的地位。阿馬加耶夫強調，「右派集團」的「右傾」行為有日漸加深的趨勢，而且外蒙古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日漸高漲³⁶。

在此背景之下，1928年1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上述問題，並通過決議：當前必須全面支持蒙古人民革命黨內的「農村派」，最終推動「農村派」在下一次的代表大會上掌握政權；必須將在蘇聯培養忠於革命的蒙古年輕人作為重要的任務，立刻派遣由蘇聯培養的蒙古大學生前往外蒙古工作，以加強「農村派」的力量；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來更換外蒙古騎兵部隊的武器。為了進一步推動決議的落實，2月16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特別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增強「農村派」在蒙黨中央內部力量的一系列措施，具體包括：在蒙黨中央內部建立團結的「農村派」集團，並積極爭取蒙黨中央內部的動搖份子，促使其脫離「右派」的影響而倒向「農村派」；為盡快完成對外蒙古軍隊武器的換裝，責成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必要的情況下增加相應的撥款；責成聯共(布)中央書記處與共產國際執委會商議，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為外蒙古省級地方的農村工作人員舉辦速成培訓班，培訓期間的所有費用開支由蘇方負責³⁷。

與此同時，外蒙古領導層也在試圖向共產國際做出進一步的解釋，以緩和雙方的緊張關係，為此，丹巴道爾吉前往莫斯科，當面向共產國際作了報告。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其報告的基礎上，做出了關於蒙古人民革命黨內存在「右傾」危險的決議草案³⁸。丹巴道爾吉表示不能同意共產國際的決議草案，並於23日將草案內容以電報形式發至烏蘭巴托，以「請求蒙黨中央主席團的指示」。25日，蒙黨中央就共產國際決議草案舉行了討論會議，參會的十三名蒙黨中央委員中有十二人表示堅決反對該決議草案³⁹。在共產國際看來，此舉無異於表明當前的蒙黨中央已經脫離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影響，遂引起共產國際的激烈反應。28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從外蒙古召回共產國際和青年共產國際代表是必要的」⁴⁰。顯然，蒙黨中央主席團對共產國際決議草案的態度，已經促使共產國際準備中斷同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聯繫。

9月1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做出了〈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決議〉，其中提到，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層愈來愈偏離保衛阿拉特的利益而倒向維護商業資本主義利益，致力於使外蒙古同資本主義國家相接近，壓制甚至採取鎮壓手段對待「農村派」代表，阻撓「農村派」同國內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派別作鬥爭。此外，共產國際對蒙古人民革命黨活動進行必要批評的行動，已經受到蒙黨中央的「制約」。共產國際執委會正式決定：改變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共產國際的聯繫形式，不再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有隸屬於共產國際和接受其領導的「必要性」，共產國際代表常駐蒙黨中央不再合適。這項正式決議特別指出，該決定即時生效，並通告蒙黨中央⁴¹。

共產國際決定中斷同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聯繫是蘇蒙關係史上非常嚴重的事件，也是蘇聯高層向外蒙古領導層施壓的非常措施和手段，意在迫使蒙古人

民革命黨領導人承認「錯誤」。這也表明在莫斯科看來，外蒙古的政治問題確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因此，共產國際決定派出由什梅拉利(Богумир Шмераль)、阿馬加耶夫等人組成的專門代表團出席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以徹底解決外蒙古問題。

三 結果：共產國際對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的改組

1928年9月1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派遣代表團參加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並向代表團下達了指示，明確代表團的任務，包括：仔細研究外蒙古當地局勢，向蒙黨中央傳達最近共產國際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指示，全力支持「農村派」，將「右派」成員從外蒙古領導層中清除^②。24日，共產國際代表團抵達烏蘭巴托。26日至27日，代表團參加了蒙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的聯席會議。丹巴道爾吉在聯席會議上做了主要發言，指出最近「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共產國際之間存在着誤會」，關於蒙古人民革命黨準備同共產國際分裂的言論是「謠言」，並指責阿馬加耶夫在黨領導人之間散布分裂言論並且製造不和^③。

應當說，聯席會議總體上是在和緩氛圍中進行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已經逐步了解清楚蒙古人民革命黨內部的形勢，而且沒有急於進行公開鬥爭，仍在耐心地等待機會。很快，代表團所期待的情形出現了——烏蘭巴托開始出現了反對蒙黨中央「右派」領導層的聲音。

10月3日，蒙古工會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烏蘭巴托召開，在「農村派」代表的組織下，來自蒙古各地的工會代表在大會上積極發言，反對蒙黨中央存在的「右傾」表現。大會決定對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進行積極干預以支持「農村派」，並且選舉出五名代表組成工會代表團準備參加七大。由於工會代表的激烈抨擊和反對，丹巴道爾吉在大會上宣布辭去其所擔任的工會聯合會主席職務，「農村派」的代表成為了工會聯合會的主席候選人^④。是次大會的召開增強了「農村派」的聲勢，是共產國際代表團抵達烏蘭巴托後給予外蒙古「右派」領導層的第一次重大打擊。最重要的是，烏蘭巴托開始出現了反對外蒙古「右派」領導層的「政治聲音」，由此，代表團便可以居中調停、推波助瀾，推動局勢朝着有利於「農村派」的方向發展。此外，「農村派」的代表成為工會聯合會主席的候選人，無疑使「農村派」獲得了反對「右派」領導層的一個重要陣地。

10月8日，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什梅拉利致電莫斯科，匯報了代表團對外蒙古局勢的看法和對蒙黨中央組織問題的初步想法，電報為絕密級。什梅拉利在電報中指出，雖然目前「農村派」領導人的力量薄弱，但是外蒙古「來自地方的代表，尤其是年輕人，多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代表團將會進一步加強「農村派」的力量。什梅拉利強調，關於組織結論和人員安排的問題，必須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召開之前擬定完成。為此，他建議讓丹巴道爾吉暫時留任蒙古人民革命黨主席職位，又將扎丹巴安排在除軍事領導崗位以外的職位；同時，從「農村派」中提拔巴德拉霍(Улзийтийн Бадрэх)擔任蒙黨中央書記、

根敦擔任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此外，蒙古工會聯合會的主席和書記均由「農村派」人員擔任⁴⁵。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給代表團的電報中指出「整體同意什梅拉利的方案」，要求代表團利用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大力提拔「農村派」人員。電報中特別指出了對丹巴道爾吉的安排，認為暫時保留其職務不妥，因為「如果將其留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那麼以後便不容易將其從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層中清除」⁴⁶。

10月10日至20日，蒙黨中央召開了七大開幕前最重要的一次會議——第三次中央全會。中央全會主要討論了蒙黨中央的政治總結報告、「農村派」的綱領、七大的日程問題。在10日的會議開幕式上，「農村派」即向「右派」領導層進行了激烈抨擊，在自由討論階段雙方互相指責，以至於什梅拉利不得不出面干預，要求會議參加者「安靜一些」。12日晚上，「農村派」代表甚至向共產國際代表團告密：「丹巴道爾吉有叛國行為」，建議將他逮捕起來⁴⁷。

在「農村派」的持續進攻下，處於孤立的丹巴道爾吉在中央全會上公開承認了錯誤。在其承認錯誤之後，共產國際代表團開始表明立場態度。10月19日，什梅拉利在會議上做了長篇發言，指出蒙古人民革命黨正在經歷重大的危機，黨領導層的錯誤在於「對右傾危險估計不足」。他宣稱：「我們很高興，丹巴道爾吉在其發言中承認了錯誤，只要承認存在右傾危險，中央全會就能正確地做好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20日，中央全會舉行了閉幕會議，並通過了決議，指出丹巴道爾吉承認錯誤是「完全正確的表現」⁴⁸。

可以看出，「農村派」在蒙黨中央全會上大獲全勝，共產國際代表團完成了對外蒙古領導層的又一次沉重打擊。最重要的是，代表團在中央全會上作了明確支持「農村派」的發言，正式表明了莫斯科的立場態度。因此，在七大開幕前，蒙黨中央內部的政治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代表團完成了扶植「農村派」上台前的所有準備工作。

10月23日，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在烏蘭巴托召開，來自15,269名黨員中的192名代表參加了會議。什梅拉利代表共產國際在大會開幕式上發言，他毫不避諱地表示，共產國際之所以派遣代表團參加七大，是出於「對蒙古人民革命黨內右傾危險積聚的擔憂」。他指出，近期蒙黨中央沒有正確對待共產國際關於外蒙古問題「謹慎而慎重」的決議和指示，蒙古人民革命黨「此刻正在經歷着重大的危機」，黨內存在大量出身於封建神權階層的「異己份子」。他在發言中強調，七大的主要任務是同蒙古人民革命黨內的「右傾」危險作鬥爭，與會代表應當在廣泛自由討論的基礎上，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制訂正確的路線方針並確保付諸實施⁴⁹。25日，丹巴道爾吉在大會上作了發言，公開承認外蒙古黨和政府內部存在着「右傾」危險，根源在於沿着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經濟，主要罪責是政府沒有進行有力的領導，導致白衛軍等異己份子混入外蒙古國家機關中；並強調所有的責任不能由其一人承擔，應當由掌握權力的整個領導層來承擔。

什梅拉利的發言無異於向全體與會代表指明了七大的主旨和發展方向，而丹巴道爾吉承認錯誤且若有所指的發言則無異於向與會代表公開表明「右派」領導層已經分裂，而且其本人已經「繳械投降」。可以說，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功地借丹巴道爾吉之口表達了對外蒙古整個領導層的指責。

10月27日，共產國際代表團致電莫斯科，表示已經成功地完成了使外蒙古領導層分裂的任務；丹巴道爾吉在七大的發言中對財政部等部門領導進行了嚴厲指責，已經「把火引向了扎丹巴和阿莫爾」，「農村派」正充分利用此局勢。代表團在電報中強調，丹巴道爾吉集團在中央全會上「已經被打敗且聲譽掃地」，代表團準備藉此機會對蒙黨中央進行「強有力的指導」，以建立共產國際代表在蒙黨中央的權威，並請求莫斯科就外蒙古黨和政府的組織問題盡快給予明確指示^⑩。

10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團單獨召集「農村派」的領導成員舉行了專門會議，什梅拉利在會上指出，「農村派」必須「保持統一，彼此團結，對共產國際忠誠」，阿馬加耶夫則向「農村派」領導人明確指出，「必須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代表大會上繼續揭發蒙古領導層中的右傾派別，之後你們將掌握黨和國家的政權」^⑪。31日，代表團致電莫斯科，表示正在着手考慮蒙黨中央的組織問題，並指出在共產國際的支援和部分使用「右派」次要人物的基礎上，「農村派」正完全掌控蒙古黨和政府的領導層^⑫。

11月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共產國際代表團「必須採取措施將丹巴道爾吉和扎丹巴從外蒙古領導層中清除」，並注意增強「農村派」在蒙古人民軍中的影響力；組建「農村派」佔絕對優勢、包括時任蒙古政府總理的阿莫爾等次要民族主義者在內新的外蒙古黨中央和政府。此外，莫斯科認為讓丹巴道爾吉和扎丹巴繼續留在烏蘭巴托是「不利的」，要求代表團「尋找合適的藉口」使兩人離開外蒙古^⑬。

事實證明，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前的布置安排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七大日程未及過半，代表團及其支持的「農村派」已經佔據了絕對優勢。代表團與莫斯科的往來電報則表明，莫斯科在遙控着烏蘭巴托的政治局勢，接下來七大將主要討論對外蒙古領導層的組織結論和新的蒙黨中央和政府人選組成問題。

11月6日，共產國際代表團致電莫斯科指出，正在執行將丹巴道爾吉和扎丹巴從外蒙古領導層中清除的方針，建議將兩人派往莫斯科，分別出任蒙古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全權代表和商務代表，並建議保留阿莫爾的蒙古政府總理職務，以及完全更換蒙古人民軍領導層。代表團認為「農村派」在國家事務管理方面缺乏經驗，為此，應立刻從莫斯科抽調指導員幹部派往外蒙古幫助「農村派」領導人。代表團在電報中強調，「我們幾乎可以在代表大會上完全自由地行動」，未來外蒙古新的領導層已經同意了「我們的建議」，在七大之後即向蘇聯和共產國際尋求「重大實際的幫助」^⑭。

11月29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外蒙古黨和政府新領導層組織人選問題通過了決議，指出應當確保「農村派」成員在蒙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佔大多數，其中應當加入五名忠誠可靠的畢業於東方大學的蒙古大學生；應當確保能夠堅決執行蒙黨中央方針政策的人員佔外蒙古政府成員的大多數。在此條件和前提下，仍然讓阿莫爾出任政府總理，並從佔大多數的「農村派」領導層中挑選一人作為阿莫爾的副手。此外，共產國際代表團應當注意，蒙古軍隊總司令的職務需要由「絕對忠誠的黨員」來擔任；在解除丹巴道爾吉和扎丹巴所有領導職務後，將派他們往蘇聯工作。最後，要求在蒙古人

民革命黨七大的決議中加入如此一段表述：「蒙古人民革命黨在共產國際的意識形態下領導工作，並且同共產國際保持密切的聯繫……」^⑤這意味着共產國際試圖完全控制蒙黨中央的黨政軍權。

根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決議指示，12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選舉了新的領導機構，蒙古人民革命黨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書記處的三名書記由「農村派」領導人根敦、巴德拉霍，以及東方大學畢業生額爾敦布奧其爾(Бат-Очирын Элдэв-Очир)擔任，拉加恩(Лосольн Лаган)為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阿莫爾留任蒙古政府總理，喬巴山成為小呼拉爾主席團主席。七大共選舉了51名中央委員和5名候補委員，31名中央監察委員和3名候補委員會。「農村派」成員佔新一屆外蒙古領導層的大多數，並且擔任了諸多重要部門的領導職務；丹巴道爾吉時代留任的中央領導人只有阿莫爾和喬巴山。丹巴道爾吉和扎丹巴則被安排隨同共產國際代表團一起返回莫斯科^⑥。12月11日，七大正式閉幕。

至此，共產國際完成了對蒙黨中央的改組，以丹巴道爾吉為首的「右派」領導人被徹底清除，以「農村派」為核心的新的「左派」全面掌握了政權。七大之後，阿馬加耶夫在發回共產國際的報告中稱：「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做出決議之後，沒有任何一個集團或是個人在任何情況下反對做出的決議……蒙古共產主義者，甚至如果他們認為這些決議是不正確的，他們也不敢直接反對。」^⑦應當說，七大達到了共產國際預期的效果。雖然要完全消除外蒙古領導人獨立自主的思想傾向是不可能的，但事實上從「農村派」上台開始，再難聽到烏蘭巴托公開反對莫斯科的聲音。通過對蒙黨中央領導層的改組，共產國際重塑了其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中的權威，保證了外蒙古領導層政治上的親蘇傾向，也確立了蘇聯在外蒙古佔優勢地位的政治影響力，進而保證了蘇聯對外蒙古經濟等方面的政策順利貫徹實施。

四 餘論

蘇聯對外蒙古的政治干預，緣起於1925年「雷斯庫洛夫事件」，經過共產國際和蒙古人民革命黨一連串的政治博弈，直至1928年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上共產國際扶持「農村派」掌權，方才重塑了共產國際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中的權威。外蒙古早期領導人很多自清末即投身於「民族解放事業」中，這批人擁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對內主張走適合蒙古國情的發展道路，對外在尋求蘇聯幫助的同時，不放棄與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開展經濟文化交往。這也是外蒙古領導人敢於發動「雷斯庫洛夫事件」表達對共產國際不滿，並多次反對共產國際決議的根源所在。通過梳理該歷史問題可以發現，共產國際對外蒙古政治干預的過程即是同外蒙古領導層不斷政治博弈的過程，直至七大之後方才確立了蘇聯在外蒙古佔優勢地位的政治影響力。

之所以說「農村派」上台確立了蘇聯在外蒙古的政治影響力，是因為掌握政權的「農村派」領導人無論政治經驗抑或文化水平均不如之前的領導人，很容易為蘇聯所控制，而且蘇聯通過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重組的外蒙古新領導

層除了「農村派」之外，還包括了蘇聯一手培養的東方大學蒙古畢業生。事實上，正是由「農村派」掌權開始，烏蘭巴托採取了完全倒向莫斯科的方針。自此之後的外蒙古領導人，如根敦、喬巴山、澤登巴爾（Юмжаагийн Цэдэнбал）等人，雖然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獨立自主傾向，但再無如此公然要求共產國際召回其代表、明確反對莫斯科指示等情況發生。

總之，對於外蒙古來說，七大之後其在政治上尋求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嘗試被打斷，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為了貫徹蘇聯對外蒙古既定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從蘇聯的角度來看，這為其後續在外蒙古推行「集體化」等各項運動，實現1945年外蒙古的徹底獨立，完成對外蒙古的經濟和社會改造，以及在亞洲落後地區推行蘇聯模式，打下了政治基礎。

註釋

① 本文中提到的「蒙」、「蒙古」、「外蒙古」等詞，如無特殊說明，均指蒙古人民革命黨政權及其實際控制下的地理區域（主要包括喀爾喀蒙古四部——車臣汗部、土謝圖汗部、三音諾顏部、扎薩克圖汗部，以及西部的科不多邊區）。

② Б. Балдо (гл. ре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брат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КПСС и МНРП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оциализм*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 1971); Б. Г. Гафуров (гл.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1);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гл. ред.),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АН СССР, АН МНР*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

③ Ц. Пунцагноров, *Монголын автономит уеин туух* (Улан-Батор, 1955); Б. Ширендыб, *Монголия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в. Истори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Улан-Батор, 1963); Б. Ширендыб,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1 г.* (Москва, 1971); С. Дамдинсүрэн, *МАХН дэлхийн коммунист хөдөлгөөнтэй холбоо тогтоож хөгжүүлсэн. 1921-1940* (Улан-Батор, 1971).

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1917-191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9）；《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與外蒙古（192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⑤ 舉其要者如劉存寬：〈中俄關係與外蒙古自中國的分離（1911-1915）〉，《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106-15；薛銜天：《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1917-1949）》，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彭傳勇：《俄（蘇）與外蒙古關係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0）；樊明方：《1911-1921年的外蒙古》（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尤淑君：〈蔣介石與1945-1952年的外蒙古獨立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1期，頁121-41，等等。

⑥ 谷繼坤：〈1918-1921年蘇俄對外蒙古政策再探討〉，《民國研究》，2018年春季號，頁15-29。

⑦ 共產國際對蒙古人民黨早期援助的相關問題，參見С. К. Рош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ии (1921-1940 гг.)*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1999); С. Г. Лузянин, "Монгол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ей (1920-1924)",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 2 (1995): 71-84; 谷繼坤：〈1918-1921年蘇俄對外蒙古政策再探討〉，頁15-29。

⑧⑨ ПАНО (蘇共新西伯利亞州委黨務檔案館)，ф.1, оп.2, д.77, л.70。轉引自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0-1922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ибирского бюро ЦК РКП(б) и Сибир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1995), 240-41。

⑩ ПАНО, ф.1, оп.1, д.529, л.56。轉引自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0-1922 гг.)*, 242。

- ①⑫ 爾菊：〈喬巴山是怎樣確立最高領導地位的——兼論蒙黨早期的內部鬥爭〉，《蒙古問題研究》，1988年第1-2期，頁2-5。
- ⑬ 〈共產國際關於外蒙古情況的資料匯總〉（1924年），РГАСП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ф.495，оп.152，д.29，л.175-76；*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онголии в 1921-1924 гг.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60），81。本文所引部分原始檔案的標題由筆者根據檔案內容總結而來，下同。
- ⑭ 〈共產國際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決議〉（1924年8月11日），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21，л.22-25。
- ⑮ 〈雷斯庫洛夫致共產國際的工作報告〉（1924年10月），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23，л.11-12。
- ⑯⑰⑱ 參見И. И. Кудрявцев и Т. Д.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Монгол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оминтерна (1919-1934)*, part 1 (1919-1929) (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НЦ СО РАН, 2012), 119; 140-44; 148-49。
- ⑲ 〈共產國際致雷斯庫洛夫的指示〉（1924年10月19日），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24，л.15。
- ⑳ 〈共產國際關於外蒙古情況的資料匯總〉（1924年），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31，л.26-27。
- ㉑ 〈共產國際關於仁欽諾政治情況的鑒定報告〉（1924年），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12，л.1-2。
- ㉒ 關於仁欽諾的文獻資料和相關研究，參見С. Б. Очиров and Д.-Н. Т. Раднаев, “Э.-Д. Ринчино.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жизни и последних днях”,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ии* (Улан-Удэ: Общ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ый центр Сибирь, 1991), 23-40; Р. Д. Нимаев, *Элбек-Доржи Ринчино. Документы, статьи, письма* (Улан-Удэ: Редакци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отдел Минпечат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урятия, 1994)。
- ㉓ 〈共產國際關於仁欽諾情況的資料匯總〉（1924年），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44，л.96-97。
- ㉔ 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Монголии，оп.8，пап.3，д.60，л.97-98。轉引自С. Г. Лузянин, *Россия-Монголия-Кита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в 1911-1946 гг.* (Москва: ОГНИ, 2003), 133。
- ㉕ АВПРФ，ф.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Монголии，оп.8，пап.3，д.60，л.140-41。轉引自С. Г. Лузянин, *Россия-Монголия-Кита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 133-34。
- ㉖ 〈雷斯庫洛夫致共產國際的總結報告〉（1925年），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32，л.180，256。
- ㉗ 〈仁欽諾致共產國際的總結報告〉（1925年），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39，л.2，14，33。
- ㉘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關於請求共產國際召回雷斯庫洛夫的決議〉（1925年6月15日），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39，л.52。
- ㉙ 無論是前文提到的丹增、鮑道等人，還是參與策劃「雷斯庫洛夫事件」的外蒙古領導人，共產國際多將這些外蒙古領導層中的「異見者」視為「右派」，他們的主要表現是有著強烈的本土自主性和民族主義情緒，有著對外蒙古發展道路的自我思考和主張，希望外蒙古能夠獨立選擇「適合」的發展道路，更多地將蘇聯視為外部援助力量，而不希望蘇聯對外蒙古過多干預。
- ㉚ 〈沃伊京斯基致共產國際的報告〉（1925年7月6日），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31，л.26-30。
- ㉛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關於請求共產國際派遣新代表前來的決議〉（1925年7月8日），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37，л.46-47。
- ㉜ 〈沃伊京斯基致共產國際的總結報告〉（1925年8月），РГАСПИ，ф.495，оп.152，д.31，л.43-51。
- ㉝ 〈共產國際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決議〉（1927年1月17日），РГАСПИ，ф.495，оп.2，д.706，л.155-59。

- ③④ 〈阿馬加耶夫致共產國際的報告〉(1927年2月)·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57, л.13-15。
- ③⑤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致共產國際的信件〉(1927年5月24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48, л.88-92。
- ③⑥ 〈阿馬加耶夫致共產國際的報告〉(1927年8月31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50, л.50-56。
- ③⑦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決議〉(1928年1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外蒙古問題召開的特別會議〉(1928年2月16日)·РГАСПИ, ф.17, оп.162, д.6, л.7, 11, 24-25。
- ③⑧ 〈共產國際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決議草案〉(1928年6月11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59, л.35-48。
- ③⑨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關於共產國際決議的反應〉(1928年6月25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64, л.105。
- ④⑩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從外蒙古召回共產國際代表的決議〉(1928年6月28日)·РГАСПИ, ф.17, оп.162, д.6, л.110。
- ④⑪ 〈共產國際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決議〉(1928年9月13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3, д.76, л.370-71; 〈共產國際關於中斷同蒙古人民革命黨聯繫的決議〉(1928年9月13日)·ф.17, оп.162, д.6, л.131-32。
- ④⑫ 〈共產國際關於代表團前往外蒙古任務的指示〉(1928年9月14日)·РГАСПИ, ф.508, оп.3, д.1, л.23-24; 〈共產國際關於中斷同蒙古人民革命黨聯繫的決議〉·л.128-29。
- ④⑬ 〈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在外蒙古工作情況的報告〉(1928年9月27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66, л.8-42。
- ④⑭ 〈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在外蒙古情況的報告〉(1928年10月3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64, л.137-40。
- ④⑮ 〈什梅拉利關於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情況的報告〉(1928年10月8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64, л.144。
- ④⑯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致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電報〉(1928年10月11日)·РГАСПИ, ф.17, оп.162, д.6, л.138; ф.495, оп.152, д.63, л.20。
- ④⑰⑱ 〈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情況的報告〉(1928年10月20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66, л.187-89; л.244-68。
- ④⑲ 〈什梅拉利致共產國際的總結報告〉(1928年10月23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69, л.7-12。
- ④⑳ 〈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自烏蘭巴托的電報〉(1928年10月27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64, л.159-60。
- ⑤① 〈共產國際代表團同「農村派」代表的談話情況〉(1928年10月28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67, л.162-64。
- ⑤② 〈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自烏蘭巴托的電報〉(1928年10月31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64, л.161。
- ⑤③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致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1928年11月1日)·РГАСПИ, ф.17, оп.3, д.1817, л.5; ф.495, оп.152, д.63, л.27。
- ⑤④ 〈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自烏蘭巴托發回的報告〉(1928年11月6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64, л.164。
- ⑤⑤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決議〉(1928年11月29日)·РГАСПИ, ф.17, оп.162, д.7, л.3-4。
- ⑤⑥ 〈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的報告〉(1928年12月10日)·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64, л.185。
- ⑤⑦ 〈阿馬加耶夫關於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大的總結報告〉(1928年12月)·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87, л.13-15。